

鴉片戰爭以前 中國若干手工業部門中的 資本主義萌芽

錢 宏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429
17

鴉片戰爭以前
中國若干手工業部門中的
資本主義萌芽

錢 宏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錄

一 鴉片戰爭以前若干手工業部門中資本主義萌芽的情況	3
(一) 江南的絲織業	4
(二) 江南的棉紡織業	12
(三) 江西景德鎮的製瓷業	17
(四) 廣東佛山鎮的鐵器業	21
(五) 陝西漢中一帶的冶鐵業、木材業和造紙業	25
二 封建主義嚴重地阻撓着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	33

研究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是一件非常繁重的工作。這個題目所牽涉的範圍很廣泛，它至少包括下面的一些問題：第一，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經濟條件下產生的，什麼時候才具備了這些條件？第二，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是怎樣產生的，產生的具體過程和方式是怎樣的？也就是中國封建社會內的簡單商品生產是如何引導到資本主義的？第三，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在產生以後的長時期內的發展過程又是怎樣的？有些什麼因素促進了它的發展，又有些什麼因素阻撓了它的發展？第四，直到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究竟發展到了什麼程度，它在中國的整個社會經濟中佔什麼樣的地位以及起着什麼樣的作用？很明顯，這些都是極端複雜的問題，因為它們決不僅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本身的許多問題，而且涉及不少有關中國封建社會的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問題，甚至還涉及中國封建社會的具體發展規律的問題。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當然與研究任何問題一樣，必須掌握大量材料，並遵循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對於這個問題的指示，認真地進行具體分析，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但是，目前我們還缺乏足以說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全部問題的豐富的材料，因此首先還得把散見在各種記載中的材料加

以細心的蒐集和整理，同時對於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各個方面進行一些初步的研究，然後才有可能逐步進行對整個問題的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本書就只是把目前搜集到的某些地區的若干手工業部門中有關資本主義萌芽的遠不完全的材料，作了初步的整理，並由此對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手工業中資本主義萌芽的情況和封建主義如何阻撓資本主義萌芽成長等方面，提出一些片斷的極不成熟的意見。

一 鴉片戰爭以前若干手工業部門中 資本主義萌芽的情況

封建社會內的資本主義萌芽，首先是在手工業中發生的，因此，研究這個問題，必須從手工業着手。但什麼是手工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主義生產，事實上，是在這個地方開始，在這個地方，同一個資本同時僱用較多數的勞動者，以至勞動過程擴大了它的範圍，而以較大的量的規模來供給生產物。較多數勞動者在同時，在同地（或在同一工作場所），在同一資本家的命令下，生產同種商品，在歷史上，和在概念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出發點。”^①這就是判定手工業中資本主義萌芽的標準。

根據這個標準來看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手工業，可以發現，在明代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而且在往後直至鴉片戰爭以前的幾百年間有着一定程度的發展。有些手工業部門中已經出現了規模巨大和分工精密的手工工場，進到了工場手工業的階段。但是，從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全貌來看，不但封建經濟依然佔着主要的和統治的地位；而且在整個手工業生產中，主要的也還是與小農業結合的家庭手工業，其次是城市小手工業和官府手工業，資本主義手工業只佔其中很小的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八四頁。

一部分。所以，對當時中國的社會形態說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雖在不斷發展，但仍然還只是孕育在封建社會形態內部的新的社會形態的萌芽。

以下把鴉片戰爭以前某些地區的若干手工業部門中資本主義萌芽的情況，加以分別的敘述。

(一) 江南的絲織業

江南的絲織業有着悠久的歷史，絲織技術也在不斷改進，民間絲織業至遲在元末至正年間（一三四一——一三六八年）已經有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作坊。當時人徐一夔在織工對中說：

“余僦居錢塘之相安里，有饒於財者，率居工以織。每夜至二鼓，一唱衆和，其聲愴然，蓋織工也。余嘆曰：樂哉。且過其處，見老屋將壓，杼機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數人，手提足蹴，皆蒼然無神色。進而問之曰：以余觀若所爲，其勞也亦甚矣，而樂何也？工對曰：……吾業雖賤，日傭爲錢二百緡，吾衣食於主人，而以日之所入，養吾父母妻子。……頃見有業同吾者，傭於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藝固過於人，而受直與衆工等，當求倍直者而爲之傭。已而他家果倍其直傭之，主者閱其織果異於人，他工見其藝精，亦頗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勝十工。倍其直不吝也。”^①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第一，生產資料已經爲作坊主私人所

① 徐一夔：始豐稿，卷一，織工對。據清人丁丙在該書跋中說：“前稿三卷，凡雜述、解說、贊詞、銘記、序跋、誄書、墓志共五十四首，皆作於元至正間。”

有，而且建立了有織機四五具和僱用十幾個工人進行生產的小作坊。第二，直接生產者的衣食雖然還是由作坊主供給，但同時有一部分貨幣工資，作為工人的家庭生活費用。普通工人的工資大致相等，而特別熟練的工人則可以獲得較高的工資。這些都說明他們是一無所有的勞動力出賣者，是僱傭工人。第三，工人可以由一個作坊到另一個作坊去工作，可見僱主與工人之間除了僱傭關係以外，沒有其他身分隸屬關係。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只有存在着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只有勞動力作為商品出現在市場上，資本家能夠購買它並在生產過程中剝削它，因而只有在國內存在着資本家剝削僱傭工人的制度時，商品生產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①毫無疑問，前述材料中所說杭州的絲織作坊應該是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作坊了。也就是說，江南的絲織業中在元末時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

從明到清鴉片戰爭以前的幾百年間，江南民間絲織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有很大的發展，這可以從下列幾方面來加以說明。

第一，織機和工人數量的增加。

明代江南的絲織業已經是當地手工業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生產部門，經營絲織業可以獲得優厚的利潤。張瀚松窗夢語說：“大都東南之利，莫大於羅、綺、絹、紵，而三吳為最。即余先

①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二——一三頁。

世，亦以機杼起，而今三吳之以機杼致富者尤衆。”^①所謂“以機杼致富者”，應該就是擁有相當數量的織機並僱用工人來進行生產的手工業資本家，決不能是僅有一兩架織機的小生產者。既然這種手工業資本家的人數在逐漸增多，那末江南絲織業中屬於手工業資本家所有的織機總數也一定有很大的增加。同時，也必然有很多的僱傭工人。例如萬曆年間，僅蘇州一地，就有完全以出賣勞動力爲生的絲織工人數千人^②。如果再加上南京、杭州等地的絲織工人，可以想見，明代江南絲織工人的數量一定是很可觀的了。

到清代，江南絲織品有比明代更大的國內外市場。國內市場以南京所產的綢緞來說，在全盛時是“北趨京師；東北併高句驪、遼、瀋；西北走晉、絳，逾大河上秦、雍、甘、涼；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嶺、湖湘、豫章、兩浙、七閩；沂淮、泗，道汝、洛”^③，幾乎行銷到全國。江南的綢緞已經成爲全國官僚、地主的必需品，所謂“朝覲、燕饗、祭祀、賓客、非寧綢貢緞，人或目慚之”^④。至於江南絲織品的國外市場，除了大家都知道的經由廣東出口以外，還有一部分自江浙運往日本，換取“洋銅”。但是由於清政府嚴格控制對外貿易，江南絲織品的

① 張瀚：松窗夢語，卷四，商賈紀。

② 明神宗萬曆實錄卷三六一載萬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年）七月應天巡撫曹時聘的奏章，其中有“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相依爲命久矣”的話。這裏所說的機戶是擁有生產資料剝削僱傭工人的手工業資本家，機工是出賣勞動力的僱傭工人。

③④ 同治上元江甯兩縣志，卷七，食貨考。

國外市場不可能自由發展。例如對日本的輸出，乾隆二十五年就議定“每船配搭紬緞三十三捲，……每捲照向例計重一百二十斤。……計額船十六隻，應攜帶五百二十八捲”^①，此外不得多運。不過，就以這額定輸出的數量來看，每年輸往日本的總數也在六萬斤以上，已經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儘管江南絲織品的對外輸出受到非常嚴重的限制，但這個國外市場的存在，對當時江南絲織業的發展，也還起着一定的促進作用。

江南絲織業在清代有這樣廣大的市場，因此織機的數量也有很大的增加。以南京為例，“乾嘉間機以三萬餘計”^②，到道光時就增加到“緞機以三萬計，紗、綢、絨、綾不在此數”^③，而“合計城廂內外，緞機總數常五萬有奇”^④。這三萬、五萬的織機，雖未必全部為手工業資本家所有，但從以後的分析，我們可看到其中絕大部分都受到資本家直接或間接的控制。在織機旁工作的勞動者，實際上都是些賺取工資的僱傭工人，從而也可以推想到南京絲織工人的衆多了。

南京以外，蘇州也是一個重要的絲織業中心，清代蘇州織機的數量遠不及南京，但最盛時也有三四千張，每機有織工一人或兩人，再加上“掉經”的女工，絲織工人總數也在一萬人左右^⑤。這較之明代萬曆年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

① 清朝文獻通考，卷三三，市糴二。

② 同治上元江甯兩縣志，卷七，食貨考。

③ 光緒續纂江甯府志，卷一五，拾補。

④ 光緒十二年二月十六日（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申報。

⑤ 見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三日（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申報。

第二，作坊規模的擴大和工場手工業的確立。

明代江南絲織業中有不少的小生產者逐漸上升爲手工業資本家，他所經營的作坊的規模也隨之而擴大。前引張瀚松窗夢語中說：“穀庵祖，家道中微。……成化（一四六五——一四八七年）末年，……購機一張，織諸色紵幣（帛），備極精工，每一下機，人爭鬻之，計獲利當五之一。積兩旬，復增一機，後增至二十餘。商賈所貨者常滿戶外，尙不能應，自是家業大饒。後四祖繼業，各富至數萬金。”^①這是一個最具體的例證。它不但告訴了我們這種小生產者逐漸上升爲資本家的具體過程，而且說明了明代中葉江南一些絲織業作坊的規模已經由元末的只有四五架織機擴大到了二十多架。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分析：“就生產方式本身說，初期的人工製造業，僅在下述一點，和行會手工業相區別。那就是同時由同一個資本僱用較多數的勞動者。行會老板的工場，不過是擴大了罷了。”^②那末，明代江南絲織業中的很多作坊，也應該是初期的工場手工業（手工製造業）了。

到清代，江南絲織業中的工場手工業有了更大的發展，這首先表現在每一手工業資本家所控制的織機的數量上。以南京來說，在康熙以前，滿清政府限制“機戶不得逾百張，張納稅當五十金，織造批准註冊給文憑，然後取織”^③。隨着絲織業的

① 張瀚：松窗夢語，卷六，異聞紀。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八四頁。

③ 同治上元江甯兩縣志，卷七，食貨考。

發展，這種限制愈來愈受到手工業資本家的反對，到康熙年間（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曹寅任江寧織造時就不得不加以取消，而“自此有力者暢所欲爲，至道光間（一八二一——一八五〇年）遂有開五六百張機者”^①。如“大賬房李扁担、陳草苞、李東陽、焦洪興者，咸各四五百張”^②。當時這種大賬房不僅在南京存在，在蘇州也已經出現了。“如石恆茂、英記、李啓泰等”，也都是“創設於乾嘉（一七三六——一八二〇年）”，到清末還存在的“織綢廠”^③。

其次，我們要看一下這種“大賬房”或“織綢廠”是怎樣經營的。在這方面還沒有找到直接記載當時的情況的材料來加以說明，只得根據較晚的記載來作一推測（江南絲織業在太平天國革命時期，曾遭到清朝軍隊的嚴重破壞，其後也始終沒有恢復到鴉片戰爭以前的盛況，因此根據較晚的記載來加以推測也不致有很大的出入）。大概江南絲織業中的賬房除了那些全部僱用工人在自己開設的作坊內進行生產的以外，還有以下兩種經營方式：

（一）“各賬房除自行設機督織外，大都以經緯交與織工，各就織工居處，雇匠織造。”^④這就是說這些賬房不但在自己的作坊內進行生產，同時還統治了大批的小作坊。根據列寧在

① 同治上元江甯兩縣志，卷七，食貨考。

② 光緒十二年二月十六日（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申報。

③ 徐珂：清稗類鈔，工藝類，織綢廠條。

④ 民國吳縣志，卷五一，物產二。參看陳作霖：鳳龍小志，卷三，記機業第七。

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中的分析：這種情形是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特徵。“這些作坊的業主不僅支配着自己作坊中的工人底勞動，並且支配着大批家庭工人底勞動，甚至還支配着（事實上）大批類似獨立的小業主底勞動”^①；而這些“織工在其中工作的小作坊或家庭，不過是手工業工場底場外部分”^②。

（二）“散放絲經，給予機戶，按綢匹計工資。”^③這種經營方式就是自己並不開設作坊，完全把絲經散放給機戶去進行生產，織成後送回賬房，領取計件工資，這種賬房實際上是組織了資本主義家庭工作的包買主。列寧說：“在商業資本底最高形式下，包買主把材料直接分配給‘家庭手工業者’，使之為一定的報酬而製作。家庭手工業者變成了在自己家中為資本家工作的真正僱傭工人；包買主底商業資本在這裏轉變為工業資本。於是資本主義的家庭工作創立起來了。”^④而這些所謂“機戶”，事實上也就是列寧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中所說的“為老板（原註：即商人，他們對手工業者發給原料，並對他們支付通常的工資）工作的”^⑤手工業者。這種生產組織，列寧稱之為“家庭手工制的大生產體系”，這“不只是資本主義體系，而且還是最壞的資本主義體

①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九八頁。

② 同上書，第三四四頁。

③ 徐珂：清稗類鈔，農商類。

④ 同①書，第三二七頁。

⑤ 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九八頁。

系，它對勞動者施行最厲害的剝削，同時又使工人最少有可能進行爭取本身解放的鬥爭”^①。

總之，不論從每一手工業資本家所控制的織機數量來說，或者從他們的經營方式來說，清代鴉片戰爭以前，江南絲織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較明代有了非常顯著的發展。

第三，資本主義萌芽在地域上的擴展。

明至清鴉片戰爭以前，江南絲織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不僅在南京、蘇州、杭州等大城市中有了很高的發展，而且也日益擴大到產絲較多的震澤、盛澤（都在江蘇吳江縣境內）等小市鎮。

震澤在宋元以前，還沒有人從事絲織業。明初明熙、宣間（洪熙——宣德，一四二五——一四三五）民始漸事機絲，猶往往僱郡人織挽。成、弘治（成化——弘治，一四六五——一五〇五年）而後，土人亦有精其業者。相沿成俗，於是震澤鎮及近鎮各村居民，乃盡逐綾紬之利”。其後隨着絲織業的興盛，至遲在清乾隆以前，震澤絲織業中已不僅有很多所謂“貧者皆自織”的小生產者，而且出現了“有力者雇人織挽”的資本主義萌芽。^②

盛澤在“明初以村名著，居民僅五六十家，嘉靖間（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漸成市。國（清）初戶口日增，每日中爲

① 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一〇一頁，附註。

② 本段引文均見乾隆震澤縣志卷二五，生計。

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年），移駐縣丞，以資彈壓，遂稱巨鎮”^①。而盛澤鎮的逐漸興盛，主要是由於絲織業的發展，因為“鎮之豐歉，不僅視田畝之荒熟，而視綢業之盛衰。倘商販稀少，機戶利薄，則凋弊立形，生計蕭索，市肆亦為減色矣”^②。在這些機戶中，也同震澤鎮一樣，出現了“雇人織挽”的屬於資本主義萌芽的一類。再從盛澤鎮每年陰曆七月十四夜間“傭織少年與拽花兒集於夜船，匯夾岸，放棹賭唱山歌，此唱彼和，達旦乃止”的所謂“接韋馱”^③的盛況看來，盛澤絲織業中一定早已有不少的僱傭工人了。

綜合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到，從明至清鴉片戰爭以前，江南絲織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確實是一步一步地在發展的。幾百年間江南絲織業從規模較小的資本主義作坊逐步發展為規模巨大的工場手工業。資本在其中不但組織着資本主義的手工工場，而且還組織着資本主義的家庭手工制的大生產。手工業資本家不但奴役着手工工場中的僱傭工人，而且還奴役着大批的小生產者。此外，像震澤、盛澤一類小市鎮中也逐漸出現了絲織業的資本主義萌芽，這又表明了江南絲織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在地域上的不斷擴展。

（二）江南的棉紡織業

如果說江南絲織業在鴉片戰爭以前就已經有了大量的資

① 同治盛湖志，卷一，沿革。

②③ 同上書，卷三，風俗。

本主義手工工場和家庭手工制的大生產，那末江南的棉紡織業是大大地落後了。從明至清鴉片戰爭以前的幾百年間，江南棉紡織業的主要生產方式始終停留在農村副業——也就是與小農業相結合的小手工業——的階段。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可以確定爲資本主義作坊或手工工場的材料。就以當時棉紡織業最發達的松江來說，也只出現了一種專織棉布的商品生產者，即所謂“機戶”^①。但這些機戶究竟是小商品生產者，還是已經僱用工人進行生產的作坊主，則還缺乏可以判斷的材料。

江南棉布在明清兩代是輸往各地的重要商品之一，它在國內有很大的銷路，一部分且運到國外。以上海棉布來說，明代就銷行到“秦晉京邊”“湖廣江西兩廣諸路”^②。清以後，雖然由於各地棉紡織業的逐漸發展，上海棉布對上述地區的銷路有縮減的趨勢，但同時却增加了對東北各省的大量輸出，江南棉布仍然有廣大的市場。而江南棉布的生產既然主要是依靠農村副業和一部分小手工業者，要滿足這樣龐大的需要，商業資本就有了廣大的活動地盤。商人從農民或小手工業者那裏收買大批棉布，轉販到各地銷售，從中可以獲得巨額的利潤。隨着棉布業中商業資本的發展，在棉布商人中逐漸出現了一些不再用貨幣而以棉花來收買布匹的包買主。明萬曆時浙江烏程人朱國禎在湧幢小品中說：“商賈從旁郡販棉花，列

① 見黃印：錫金叢小錄，卷七，稽逸二，引梁溪雜事。

② 葉夢珠：閩世編，卷七，食貨五，上海掌故叢書本。

肆吾土。小民以紡織所成，或紗或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歸，仍治而紡織之，明旦復持以易。”^①這些商賈就是上述的包買主。到清乾隆、嘉慶年間，這種包買主還繼續存在。例如南潯“市之賈俟新棉出，以錢貿於東之人，委積肆中，高下若霜雪。即有抱布者踵門，較其中幅，以時估之，棉與布交易而退。隨有西之人，齎錢來，計布值，合則書劑與之去而錢存焉”^②。無錫在清代也盛產棉布，乾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淮、揚、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馬頭”之稱。而當地所產棉布中除了“一以二丈四尺爲疋，曰放長，則以易米及錢”外，其他“一以三丈爲疋，曰長頭；一以二丈爲疋，曰短頭；皆以換花”。這種以棉易布的方式使包買主可以獲得很大的利潤，所以“坐賈之開花布行者，不數年即可致富”^③。

包買主用棉花來收買的棉布，雖然其中大部分依然是由農村婦女作爲一種副業所生產出來的，但也有不少是由一些專以紡織爲生的家庭手工業者所生產的。這些家庭手工業者不僅在城市中早已存在，而且在農村中也逐漸出現。乾隆年間，無錫“東北懷仁、宅仁、膠山、上福等鄉，地瘠民淳，不分男女，舍織布紡花，別無他務”^④。這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包買主對於這一部分人的關係，按照列寧所說：“如果製成品底

① 明史及湧幢小品中無此文，此處自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二，物產二轉引。

② 施國祁：吾貝居暇唱，附金源割記後。咸豐南潯鎮志，卷二四亦引此文。

③ 此段未註明出處的引文均見黃印：錫金識小錄，卷一，備參上。

④ 黃印：錫金識小錄，卷一，備參上。